

【文学研究】

论劳伦斯小说艺术创作观念的思想渊源

李 晓 侠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为探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戴·赫·劳伦斯小说艺术创作观念对现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者的启发和借鉴, 分析了劳伦斯小说艺术创作观念的思想渊源。分析认为: 对劳伦斯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3个人; 尼采非理性主义的生命意志和超人哲学全方位地影响了劳伦斯文学创作, 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影响了劳伦斯的生命文艺观,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深刻影响了劳伦斯创作性爱情结。分析表明, 中国现当代作家需要从哲学理念角度提升人文情怀。

关键词: 英国文学; 劳伦斯小说; 尼采; 柏格森; 弗洛伊德

中图分类号: I3/7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4-0046-05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of Lawrence's novels

LI Xiao-xi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deologies in artistic creation of David Herbert Lawrence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artists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es and sources of Lawrence in his artistic cre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great influence on his creation comes from such philosophers as Nietzsche, Bergson and Floyd. Nietzsche's irrationalist will and superman philosophy have strong effect on his creation, Bergson's living philosophy affects his living artistic ideology and Floyd's mental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fluences on his sexual complex in creation. All these indicat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artists of China should upgrade their humanistic sentimen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ideology.

Key words: British literature; Lawrence's novels; Nietzsche; Bergson; Floyd

0 引 言

一般而言, 秉持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大师在体现观照生活、折射时代、宣泄喜怨、再造读者的文学创作基本职能时, 其作品本身大部洋溢着“问题意识”催化下的敏感、警策、思索、预测等显著特色。英国小说家戴·赫·劳伦斯正是这样一位作家。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除了作者本人的天赋以外, 更重要的是和他积极汲取同时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精华作为自己创作养料的努力分不开。对劳

伦斯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3个人, 他们是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

1 尼采非理性主义的生命意志和超人哲学对劳伦斯全方位的影响

尼采对劳伦斯的全方位影响主要是通过书籍、社会和家庭3个路径完成的^[1]。1908年劳伦斯被英国诺丁汉大学授予教师资格后开始在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镇戴维森路中学教书。这一时期劳伦斯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 并经常谈论“强力意志”。1910

年的东林镇(劳伦斯的故乡),“年轻人总是在谈论尼采、瓦格纳。列奥珀狄、福楼拜、卡尔·马克思、达尔文”^[2]。1912年劳伦斯与弗丽达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从此没有分离。弗丽达是德国人,出身名门,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不言而喻,尼采的思想通过弗丽达在劳伦斯的心中激起了共鸣。

尼采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深深地影响了劳伦斯的创作倾向。尼采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哲学大师,他对置身其中的工业化时代深感不安;尼采又是一个钟情于大地和天籁之乐的自然主义者,他明确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教育制度和基督教旧道德价值体系的不满。劳伦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人的自我实现是背道而驰的,它使人的世界发生了全面的异化:既使人类与大自然异化;也使一部分人与另一个部分人异化;还使社会发展同个人心性之间异化。在《恋爱中的女人》、《虹》、《察特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中,劳伦斯像卡夫卡一样采取浪漫、夸张、变型的手法,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程中怎样导致了“活动变人形”,把人异化为怪异的、卑微的物的悲惨事实,从而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人性异化的厌恶之情和批判意识。

尼采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又剖析了之所以产生异化的根源,认为都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惹的祸,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文化观。尼采认为,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科学精神就取代了人文关怀。与尼采一样,劳伦斯也对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相连的教育制度给予了抨击。《虹》中的厄秀拉本是满怀希望去一所小学当教师,但发现学校简直是充满着龌龊交易的腐败渊薮。在那儿,每个人都有捞钱的伎俩,而原始性的创意和革新则丧失殆尽。孩子们丧失了创造的活力,被训练成“对物质利益偶像奴颜婢膝的人”。毋庸置疑,英国当时的教育已成为金钱交易和培养“物役性人格”的温床,成为“一种否定自我的非人力量”。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文化观与基督教文化一脉相承,最大的弊害是造成了人性的残缺不全和生命本能的衰竭。它必然导致人的“本真”状态的死亡(苏格拉底极力认同这种“死亡”)和对形而上理性的悲剧性痴迷。于是,站在19世纪的门槛上,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上帝死了”,并自命为“杀死上帝的凶手”。尼采认为,西方几千年来的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道德价值体系都需要重估。所有这些都在劳伦斯那里得到共鸣。劳伦斯从年轻

时代起就怀疑基督教,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应当面对现实、拥抱生活,去实现生命的意志和人性的复归。因此,尼采要重兴“狄俄尼索斯”境域,在现代人的废墟上再建“丰盈之生命”,再建那种与宇宙本体融为一体并体现其无尽创造力的伟大、健全的生命。而劳伦斯则认为宇宙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美的、神圣的。宇宙万物皆有联系,并认为“我们的生命就在于同周围活生生的环境建立一种统治的关系。我‘拯救我的灵魂’是通过我和另一个人,我和其他人,我和一个同学,我和一个种族,我和动物,我和大树和花朵,我和地球,我和天空和太阳,我和月亮建立一种纯洁的关系,无穷无尽的纯洁的关系”^[3]。基于这种认识,劳伦斯竭力表现人性中那种潜意识或无意识活动,颂扬生命现象,将本能冲动视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力量、一种最真实的存在。然而,现实世界是异化了的,现实的人生也是病弱苦难的,于是像尼采一样,劳伦斯也勾画出一个美好“乌托邦社会”,并且创造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人物——超人,以拯救社会。尼采的“超人哲学”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道出了何谓超人:“我教你们以超人。人是被超越的东西,你们将怎样超越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4]。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因为每个存在体内部都有巨大的“强力意志”,这种意志的发挥可以使人们自我再造;同时,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岸世界”,大地才是实在的,不存在任何超验的“彼岸世界”,因此,“超人”就是忠实于现世的生活。这种否定“来世”的人同那些所谓的虔诚的基督徒显然是对立的。劳伦斯追求艺术创作中的“伟人”和“英雄”的再现,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劳伦斯的生命文艺观的影响

生命哲学(德文原名为 *Philosophie des Lebens*,又可译为生活哲学、生的哲学)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各国流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其理论成果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在哲学本体论上坚持万物有灵、“万物有生”、生命是宇宙本原的观点;二是在认识论上,把超验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直觉”看成获取内心体验性知识的不二法门。柏格森是20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生命哲学流派中最具影响的人物。1900—1924年,他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在这里的讲课获得极大成功,许多校外人士,甚至许多追逐时髦的巴黎上流社会人物,也被吸引前去

听讲,以至于在当时的巴黎社会形成了崇拜柏格森的疯狂性群众性行为^{[5]128}。柏格森在当时断言,世界的基础就是一种生命力,即盲目的、多变的、连绵不断的“生命冲动”,这就是“绵延”(duration)^[9];并认为它既是人的一种心理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是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在认识论上,柏格森提出了直觉主义的方法。“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7]82},从而造成了主客一体化的无差别的境界。柏格森在宣传自己的直觉主义神秘方法时,极力反对人类的理智(理性)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否认人们以理智的形式(感觉、概念、判断等)和理智的方法(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归纳等)所表现和获得的知识具有实在的、客观真理的意义。柏格森认为,科学是人们为了行动的方便而作出的一种假定。它们只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理价值。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实在的、内在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纯粹是为了使用实在。这种囿于冷冰冰的经济算计的功利主义倾向,只能强化人们的利益神经并堵死人们接近真理的康庄大道。于是柏格森直接劝诱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说:“哲学的职责必定是摆脱那种完全是理智的东西的形式和习惯,必定是积极地研究和考察活的东西,而不顾及实际的使用……”^{[7]153}。所有这些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劳伦斯的文艺观。

从劳伦斯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步中所表现的唯科学的马首是瞻的理性主义倾向深表忧虑。劳伦斯认为,文艺的灵魂恰恰是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因而这才是救赎人类的不二法门。劳伦斯敏锐地觉察到,工业化、科学化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过分张扬了工具理性的一面,经济理性、资本利润、物质商品就是一切,而人的感性生活、情感需要则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也变得粗俗平庸、黯然失色。对此,劳伦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要用和谐的自然、人的原始本能与现代文明相抗衡。同柏格森在抗衡中找到了“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武器相似,劳伦斯则把这种希望寄托于对人类“下意识”的生命本能的挖掘上。“他深信,人生之真正的美只存在于下意识的纯真状态。他幻想着‘自然人’的复活、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淳朴和美好关系的复归”^[8]。因此,劳伦斯文艺创作的目的是要恢复人的非理性情感,揭示内在生命的真实运动,探讨生命的价值和宇宙的奥秘。

劳伦斯的文艺批评观基于他的“血性哲学”。这

种哲学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一样,是以非理性、反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这体现了他对功利主义的厌恶和对文艺纯洁王国的维护之心。他曾写道:“我最大的信仰是血性的信仰和肉体的信仰,血性和肉体比理智更聪慧,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所信和所言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9]。他认为,一切理性的认知形式都是采取绝对僵固、静止不变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它们无法把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无法描述变幻无常的生命活动;凭借“血性意识”,人就可以真正意识到他人或活生生的实体世界,就可以表现生命力的勃然喷发;“生殖生命”是自由的、审美的表现,必须忠实于奔突、奋进、不断“绵延”的感性生命本身,从而不断在“以情抗理”中突破僵化的理性外壳的束缚,去发现创造真实的自我。他认为人生和艺术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对生命的表现是文艺的唯一目的和最高使命。

同柏格森等生命哲学家的“物活论”观点相似,劳伦斯在《启示录》中提出:“我们和宇宙是一体,宇宙是我们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巨大生命体”。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要揭示这个生命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如何揭示呢?劳伦斯认为就是艺术。他认为艺术的职责就是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在劳伦斯看来,小说是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最能表现运动着的生命与宇宙之间的有机联系,它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揭示细微内在联系的典范”^[10]。劳伦斯认为,只有直觉才能在揭示这种精微关系中挖掘美,认识美,把握美;直觉是沟通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并可使人在短暂的瞬间产生“物我合一”的境界。

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对劳伦斯小说创作性爱情结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85—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哲学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伦斯被称为一位最醉心于弗洛伊德的作家。因为两人都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的无意识领域,强调情欲在人性中的基础作用。

1913年,劳伦斯出版了带有浓郁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从而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英国文坛巨匠的地位。小说选取的是一个表达俄狄浦斯情结的恋母主题。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恋母情结”,以致于批评家们欢呼,《儿子与情人》在英国文学史上首次深入地触及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俄狄浦斯情

结。乐于干预社会生活、长于社会心理学分析法的劳伦斯对把他的创作主旨归于弗洛伊德门下的社会认定直言不讳。关于这一点,劳伦斯本人也曾在给出版商加尼特的信中作了说明:“……当儿子长大起来时,她(葛楚)挑选他们作情人,首先是最大的儿子,随后是第二个儿子,这些儿子由于与母亲之间的爱的推动而来到人世,并且一直受到这种力量的推动。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们都失去了恋爱的能力,因为母亲作为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旦与女子接触便趋于分裂。”接着,劳伦斯认为这个作品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是成千上万英格兰年轻人的悲剧……这个古老的儿子——情人的名字是俄狄浦斯。他的新名字则是芸芸众生”。

在小说中,我们会发现葛楚与保罗之间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母子之爱。葛楚以对儿子的爱来填补对丈夫的失望而造成的情感真空,他与儿子“两人亲密无间地交织在一起,她的生活扎根于保罗身上”。与此同时,保罗也沉浸在对母亲的感情之中,与母亲在一起,他的爱会像泉水一样喷涌,他的灵感会像火焰一样闪光。劳伦斯力图阐明,俄狄浦斯情结不是儿童性反常的表现,而是机械文明对自然欲望压抑的产物。与“母亲”相联系的是以文明为武器的统治,使“儿子”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沦落。文明的总危机根源于这种由于母性溺爱所造成的“阉割崇拜”。《儿子与情人》所批判的,正是这种用精神意识代替了肉体意识(即劳伦斯所倡导的“血性哲学”),它给人类带来的毁灭。

当然,劳伦斯在传承弗洛伊德思想时是有所“扬弃”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可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1]。其中无意识是关键的一环,无意识表现为本能的冲动。文明之所以可能在于人有不断克服和超越的情怀,并表现为一个人生命历程中3个前后相随、相互联结的阶段,这就是弗洛伊德有名的“三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生起点应该是“力比多”(即性欲)特别强大的本我阶段,此阶段的个体只信奉“快乐原则”而我行我素,这必然会给外部世界带来破坏性影响;中间阶段为自我阶段,这时的个体由于纳入了“情景”变量而恪守求实原则,显得较有亲和性并希望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共赢”;人生的最高境界则为超我阶段,此时的个体完全是宗教般的利他性的活着,这种克制私欲一心奉献的人才是最健康的人格。从肯定人的性欲到走上对人的欲望的“扬弃”,正是弗洛伊德哲学致思的基本理路。

对弗洛伊德上述精神分析的成果,劳伦斯给予

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劳伦斯认为我们文明的最大灾难不是性,而是对性的病态和憎恨。对性爱本能不要加以任何形式的限制、束缚和压抑,他主张对人的本能、本性最充分、最自由、最完整的表现和释放。在他看来,“性”就是“美”,而“美”是一种经验、一种闪光。“性”和“美”就像火与火焰,生命与意志一样不可分开。一旦丧失了性,人就得丧失个性和创新的源泉,世界末日也就到来了。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只是从“本来如此”的事实维度承认了弗洛伊德对性进行客观性描述的价值,而从“应该如此”的价值维度讲,他对弗洛伊德的观点给予了“扬弃”。为此,劳伦斯提出了“血性意识”,并认为这一概念中蕴含着具有两重规定的我:一是肉体的、富有同情心的、满怀热望和激情的我;二是精神的、具有意识的我。劳伦斯认为,当两种“我”互相打架时,人就应该选择肉体的我的绝对命令来行事,他认为:“血性比理智更聪明”,人不应该以理摄情,而应打破理的桎梏,而造成肉体感受性为先的血液与心灵的动态契合。

4 劳伦斯小说创作观念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劳伦斯扎根于哲学的富矿地带钻探寻宝,从而使其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对现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者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升华自身的创作境界不无启发。纵观现阶段中国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问题多多:如无关社会“痛痒”,只写自己小感受者有之;囿于描述生活现象,只反映生活的“原生态”而不做反思批判者有之;只暴露生活的阴暗面,不预测生活趋势并提出解决的方案,维护建设性的情怀和问题意识缺乏者有之,甚至趋时媚世,满足于“自了汉”式的境界,信奉道德犬儒主义者也有人在,所有问题的病根就是文学创作者的非学者化倾向使然。由于失去了理论思维的“观照”,我们的作家在哲学理念和人文情怀方面极度萎缩。比如,“敏感”是劳伦斯作品的一大特色,而创作者要致成这一主体特色,没有理论思维的“观照”几乎不大可能。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有一个观点,即当改革占据主导潮流的时代,新闻记者、作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乃至法学家,一般会因其自身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特色,往往对社会问题心存敏感,他们也因而承担了“描述问题—诠释问题—预测走势—解决问题”来干预生活的使命。一般而论,作家要想成为社会敏感集团的中坚,就必须要有理论思维的偏好。黑格尔曾指出:“敏感就是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本质

和概念”^[12]。胡塞尔更认为:“本质并不是一种隐藏于现实背后的东西,一个人在直观中立刻把握呈现在感性观察中的本质”^{[5] 179}。这种“立刻把握”的气质也即美国社会评论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想象力”。我们认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想完成反映生活本质的“宏大叙事”和优秀作品,就一刻不能没有这种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培养一点都离不开哲学,所以文学只有和哲学联袂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劳伦斯就是自觉应用哲学并将其作为世界观来观照生活的成功典型。正是得益于哲学的滋养,他才能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发觉“直接”外在的东西背后的“意义、思想、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概念”。

5 结 语

劳伦斯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与其汲取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三人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无疑,这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升华自身的创作境界是有启发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罗 婷. 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北京: 东

方出版社, 2002.

- [2] 罗 婷. 论戴·赫·劳伦斯的继承与创新[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 5(3): 97-102.
- [3] 劳伦斯. 安宁的现实——劳伦斯哲理散文集[M]. 姚暨荣,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 [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楚图南,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5] 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6]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 [7] 柏格森. 形而上学导言[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8] 米哈尔卡娅. 论劳伦斯[J]. 文艺理论研究, 1988, 9(1): 88-95.
- [9] Aldous Huxley. The letters of Lawrence D H[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7.
- [10] 劳伦斯. 灵与肉的剖白——劳伦斯论文艺[M]. 毕冰宾, 译. 南京: 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1.
- [1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 尘, 张唤民, 陈伟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12] 黑格尔. 美学: 第1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上接第40页)

此外, 中唐杨巨源《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十首》云:“化入綈组大, 恩垂涣汗馀。悠然万方静, 风俗揖华胥。”^{[2] 3 734}此诗为奉和应制之作, 诗人盛赞圣上, 标举当朝承华胥之遗风, 认为在当朝的统治之下人与人自然、淳朴、和谐。晚唐诗人张绍《冲佑观》云:“大始未形, 混沌无际。上下开运, 乾坤定位……心悬真洞, 梦到华胥。乃眷名山, 追惟圣迹。”^{[2] 10 024}这反映了诗人崇尚道家的身心自由和清静无为。中唐郑絪《奉和武相公省中宿斋, 酬李相公见寄》云:“高阁安仁省, 名园广武庐。沐兰朝太一, 种竹咏华胥”;^{[2] 3 581}陈陶《圣帝击壤歌四十声》中云:“寤寐华胥国, 嬉游太素乡。”^{[2] 8 484}这些诗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那种自然、淳朴、和谐民俗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4 结 语

在文明盛世的唐代, 文人歌咏“华胥国”, 并非提倡回到“茹毛饮血”的远古社会,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道家的清静无为, 走上了积极的进取之路, 拓宽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之意。不管是初唐、盛唐, 还是中唐、晚唐, “华胥国”都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反映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积极追求。“华胥国”的

理想社会模式也能对生产力高度发达、文明层次更高的现代社会提供有用的借鉴, 其描绘的人人平等, 人与人自然、淳朴、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不无裨益。“诗言志”, 唐代文人或诗或文, 借“华胥国”或歌颂盛世, 或讽谕现实, 或虚拟自己精神世界的“无何有之乡”, 丰富了诗文的个性化表达, 这些都是“华胥国”这一古老传说穿越历史沧桑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 蒋清翊. 王季安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4] 李 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5] 詹 锓. 李白诗文系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6] 欧阳修, 宋 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7] 瞿蜕园. 刘禹锡集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8] 陈鼓应. 老子注释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9] 王 绩. 王无功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